

试析陶印和陶印模中的媒介转换

杜少舍

(陕西科技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 陕西西安 710021)

摘要: 陶印和陶印模同宗同源,在文化传播、艺术表现和器物装饰中,媒介转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对陶拍、陶印模、陶印范、陶滚筒印等进行研究,从陶印和陶印模的物理形态分析媒介转换的三种方式,试图从二者的使用角度分析其的强大生命力和影响。

关键词: 陶印, 陶印模, 媒介转换

在陶瓷器的制造过程中,模具的使用是人类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的手段之一,在野蛮时期的低级阶段,人类的高级属性开始发展起来了^[1]。而这种作用于陶瓷器上的工具后来逐渐演化为代表中华文明中最为重要的“信物”——印章。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代表模具的陶印模为适应器物的需要向更紧密结合器物本身特点而发展;代表信物的陶印则逐渐向独立的纹饰与文字印章方向发展。印章形态的“印”为名词,大部分情况代表印章实物,而陶印模的“印”为动词,是按压(压模)的动作,笔者赞同孙慰祖先生的观点:作为一种“艺术样式”的篆刻,更接近“印模”(die)^[2],本为同一概念的印模,站在篆刻家、印学研究者的角度它是印章起源的雏形,而站在陶瓷设计和陶瓷美学者的角度被看做是制作陶瓷器的模具。本来与陶印同宗同源的陶印模始终服务着人类的生产生活。然而他们错综复杂的关系表现在不同时期形态各不相同,以及在使用的过程中产生了媒介的转换。

一、陶拍、陶抵手和印纹陶

陶拍,是陶器拍印花纹、加固胎体的工具。虽然陶拍在印学研究领域还无法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印章,但是作为最早的陶瓷制造工具是确定无疑的。人类最初的陶器,多数是在编织的筐篮或木制容器上敷上泥巴制成的。随着陶瓷成型技术的发展,在陶器的制作过程中往往将编织或捆扎的藤、竹固定在手持工具上,这种工具最初可能是木质的,后来出现了陶制工具——陶拍。从拍印纹样看,山东齐国故都的临淄出现大量的陶拍,拍面纹饰有绳纹、方格纹、涡纹、叶脉纹、水波纹,与当地出土的陶器纹饰相符,年代也与陶窑时代对应吻合,与我国江南地区印纹陶的几何纹饰如出一辙,在印纹陶中,除了少数运用尖状器物刻画而成外,几乎都是使用陶拍这种工具,由此印证了印纹陶上出现的纹饰是用陶拍抑压而成。需要说明的是在陶器成型过程中,和陶拍配合使用的器具——陶抵手,为了防止器表拍印纹饰时器壁凹陷,用于在器内支撑拍印。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文明进程的加速,陶拍的使用,需要多次重复压印出固定纹样、符号,所以从拍打工具过渡到了印压工具,并将这一工艺很好的延续下来。

二、陶印模和陶印范

黄宾虹在《竹壮移台印存》弁言中说:“古昔陶冶,抑埴方圆,制

做彝器,俱有模范,圣铄巧述,宜莫先于治印,阳款阴微,告由此出。”这段话便道明了印模与印范的关系。“模”和“范”本是在青铜器铸造工艺中组合使用的,在这里是指制作彝器时先后做出来的两样东西。但是在陶瓷器制作的一次性模压成形工艺中,情况就不同了,“抑”就是手持工具在较松软的材料上下按压的动作,抑出的图每次都是同形重现,这也是后世抑印复制的根本意义与价值,用来抑的器物就是印模,简称为“印”,在印章发生之前,很可能有其他印模先行问世,比如人们常说的“陶印模”。

莫小不先生在《阴阳流变》^[3]一书中提到:“印章因为自身的种种价值,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模”或“范”,印章成为艺术之后它的这种工具性才渐渐消失。尽管青铜器铸造和陶器压模两种工艺中使用“模”和“范”的概念极为接近,但是从物理形态角度讲铸造的青铜器属于一种圆雕,而陶器模压工艺中的印模纹饰(或文字)都属于一种浅浮雕。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青铜器上铭文的制造方法也是印模所为,类似于泥活字范^[4]。到了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出现的族徽从氏族部落的萌芽逐渐迈向国家集权的统治象征,这一实现亦是陶制的母范翻铸转印的过程。

三、滚筒印

从《齐国陶拍》^[5]一书中的划分,陶制的滚筒印是陶拍的一种,并且很明显是从拱形、半圆形再到圆柱体的陶拍演化发展的。临淄城北东周村出土的中粗绳纹陶拍,呈圆弧拱状,背面凹形槽内可镶嵌一长条状带手柄的木棍。用以拍打陶器,使绳纹均匀细致地分布在陶器表面。这样既省力又省功,减轻了劳作强度,提高制陶效率;临淄城东堤付村出土的另一件中粗绳纹陶拍则直接为滚筒形制,为圆柱体,中空,其内可以穿插上木棍或木棒,使用时可以在陶器上滚动,这样大大节省了印制花纹的时间。西方的两河流域和古埃及地区都曾出现过大量纹饰内容极其丰富的滚筒印,无论在中西文化中的称谓有怎样的不同,我国的这种陶制滚筒印无论是形制还是使用方式均与西方的滚筒印有着高度的相似性,在中国印学研究体系的“封泥”便和西方的滚筒印的“封印”有着类似的功能,不容忽视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可能性。

四、媒介的转换

刘佃坤在《陶瓷印的产生与流变》^[6]一文中提出了在“陶印”这

个概念中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是指玺印的质地为陶,其二是指用以戳压在泥质陶上的文字或徽记的印模(此印模材质可为陶、木、铜等)。另外,牛济普在《中州印陶概述》^[7]中提出:我们所研究的“印陶”则仅限于商器上的玺印“印样”,它是玺印使用的副产物,犹如“封泥”,是印章盖压在泥上所产生的“印样”一样。由此可见,“陶印”与“印陶”是互为表里的物理形态。按照刘佃坤对于“陶印”的第二种表述,由印模的正形(阳)压印在未干的陶器(或黏土)上,可以得出一个相同纹样的负形(阴),这种印模在西方文明中也很常见。从技术原理看待陶印模问题,在模压成形的工艺中存在着工具媒介的转换现象,印体和承印物之间媒介的转化有时存在二次转换甚至是反复转换的现象。这些图形、符号又反过来影响他的母体。笔者将其概括为:木转陶、铜转陶以及陶转陶三种形式。

第一是木转陶。史前时期人类通过编织草、藤、麻、竹条以及树枝等类似于木质材料,编织物用来支撑软泥,而后将织物纹样抑压在陶器上,作用于陶器的制造,但是木头容易腐烂或者“葬身火海”,工具使用由“木拍”到“陶拍”,当熟悉的材料被赋予了新的功能,这种偶然遗留的“印样”不仅永远留在了陶器上,还留在了先民的心里,最终逐渐形成一种心里渴望或期待^[8]。所以后来的陶拍或陶模上便大量出现了席纹、叶脉纹等仿生纹,转印在了印纹陶上,并发展演变为经典的传统纹样,以及现今大量陶文的孑遗被推测最有可能是木印模所为。

第二是铜转陶。铜与陶的材料媒介转换涉及到印章的起源问题。温廷宽先生论述的较为详尽:由于铜器的大量生产,工作方法需要改进和提高,就另外做些铜或泥制的文字、花纹小模,当做再制时的参考样品,遇有文字花纹样式完全相同的,也可以把样品印到泥模或蜡上略加修饰再铸。用几块原始模子,可以在生产铜器上节省很多时间和精力^[9]。由此可见,铜印虽然不被看做青铜时代的典型器物却与青铜器雕铸的工艺如出一辙,二者都是在铜与陶的媒介转换中完成的,我们也拿后来的青铜器雕铸来作当时铜印制作工艺上的一种推想。夏海超在文章《唐代陶质官署印性质研究评析与新探》^[10]中考证了“长安县印-安定郡印”、“阴槃县之印”双面印就是用于制作正式铜质官署印的印母,即用来雕铸铜印的陶印模。但是青铜器的陶模和铸造金属印章的陶印模不可混为一谈,尽管二者在制模和范以及铸造工艺上有着相同的原理。

第三是陶转陶。无论是两河流域出现的陶制滚筒印、古埃及和印度河谷地区的滑石印,还是我国出现的陶拍,经过烧制达到一定硬度后,可以反复使用,加盖在黏土或陶泥上。前文所述,在一次性模压成形工艺中,陶印模便起着“物勒工名”和“以检奸萌”的作用,前者对应陶文,后者对应封泥,以及印章在泥土上所压印迹,包括封泥、瓦当、模印砖上的戳记,这印迹不仅仅是用来观赏和装饰的纹样,主要用途是可封、可赏、可证等等。同为陶制的印模和印范在后来大放异彩的铸印时期,表现在同为陶这一材质的模与范的交替转换中。特别是出于宗教传播的原因,我国汉代出现的陶制

“黄神越章”以及西藏的擦擦艺术(脱模泥佛)都在使用中大量产生了陶与陶的媒介转换的实物。陶转陶这一类情形的复杂性也在于同作为一种材质的印模和承印物互为表里,所以在印学研究的初期会有人将封泥误认为陶印,分不清何为目的,何为手段。

因为陶土的材质柔软,可塑性强,虽然同为一种媒介,无论是雕刻还是压印都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在使用中可以反复转换。以至于印章为后来的印刷术做出了铺垫:用墨在纸张上印刷,在中国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史前史”,这个长时间的孕育阶段是在柔软的材料,主要是在泥土上完成转印的。中国的印章包含着这两个具有历史联系与形态的承接,但性质并不相同的部分。由此看见中国印章的强大生命力也是在材质媒介的转换中得以延续:一种文化一旦形成并演化为传统,在文化传播中,既可以排斥外域文化,又有能力将外域文化吸收过来为自己所同化,从而确保自己的个性和存在价值^[11]。媒介转换不仅是物理形态的机械复制,除了文化传播的功能以外,催生了包括版画艺术、篆刻艺术、陶瓷印模装饰等更为丰富的表现形式的诞生,亦对当代陶瓷印的研究与创作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3页
 - [2]孙慰祖.中国印章:历史与艺术[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0年.第2页
 - [3]莫小不.阴阳流变:中国印章的形态与审美[M].杭州:西泠印社,2004年.第45页
 - [4]德·雷德侯.万物[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27页
 - [5]孙永行.齐国陶拍[M].济南:齐鲁书社,2012.第12页
 - [6]刘佃坤.陶瓷印的产生与流变[J].齐鲁艺苑,2017(03):54-59页
 - [7]哈尔滨市美术家协会.当代印学论文选[M].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87年.第1页
 - [8][英]哈登.艺术的进化:图案的生命史解析[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2页
 - [9]温廷宽.印章的起源和形肖印[J].文物参考资料,1958,(12):23-25页
 - [10]夏海超,何庄.唐代陶质官署印性质研究评析与新探[J].档案学通讯,2017,(05):30-34页
 - [11]启良.东方文明畅想录[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第15页
- 作者简介:杜少含(1990.1-)男,汉族,籍贯:陕西西安人,陕西科技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21级在读研究生,硕士学位,专业:美术,研究方向:陶瓷印,陕西省书法家协会会员,终南印社社员,骊山印社社员,陕西汉唐石刻博物馆理事会理事,西安中国画院院聘书法家,本科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国画系,篆刻作品收藏于万印楼、平湖市陆维钊书画院等机构。